

WANG XIAO SHU ZUO PIN JI

歲月如歌

中国当代实力派画家

ZHONG GUO SHI LI PAI HUA JIA WANG XIAO SHU

汪晓曙
黑白作品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



J221.8/38

2009

汪晓曙
黑白作品集

中国当代实力派画家
ZHONG GUO SHI LI PAI HUA JIA WANG XIAO SHU ZUO PIN JI

广东人民出版社

歲月如歌

WANG XIAO SHU ZUO PIN J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汪晓曙黑白作品集/汪晓曙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18-06156-6

I. 汪… II. 汪… III. ①速写-作品集-中国-现代②素描-作品集-中国-现代③插图-作品集-中国-现代④连环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3602号

主 编: 卢家明

责任编辑: 陈植荣

装帧设计: 李茂宁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编: 510102)

<http://www.gdpph.com>

E-mail: tg@gdpph.com

电话: 020-34075206

传真: 020-34075206

广东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编: 510102)

电话: 020-83793888

印刷: 广州市鑫洋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889x1194 毫米 20开 32印张

版次: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68.00元

序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卢延光

十多年前，黎子流市长当政，竭力推广普通话。顺德口音的“煲冬瓜”（广州方言“普通话”的音译）给广州增加了一种杂交的更难听懂的语言品种，那时期，黎市长说普通话的故事，虽然有很多美丽的笑谈，然而，这个充满包容度的城市倒也真努力地、认真地去学习普通话，成绩有目共睹。

对于来广州工作定居的新客家，这些年我倒是极力向他们推广粤语，引导他们多讲，多听。这不完全是保护地域文化语言遗产那么简单的问题，而是认为他们既然生活在广州，就应该在语言上融入广州，才能做地道的广州人。

已是百分之百广州人的汪晓曙，从江西到广东已有十多年。他对我说，广州话“识听吾识讲”，于是我鼓励他向黎子流学习。他的广州话像黎子流的普通话一样，江西音、普通话加粤语，半咸不淡、不伦不类也成了笑料。汪晓曙够胆亮相于众，我佩服他的勇气。

凭这股勇气和艺术底气，这位江西老表，进了广州师范学院。从艺术系主任开始，十多年的努力，从老表到老广，从系主任再到名声大噪的广州大学美术学院的院长，已经成为广州文化的一名突出的代表人物，其间变化之大，令人瞩目。作为九省加港澳地区通衢的广州，群雄并举，逐鹿其间，历年积淀之人才多不胜数，特别是美术方面的成就更为突出，傲视群雄于神州海外，成全国三足鼎立之势。要在广州学术界令各路精英服气，更不是件易事。汪晓曙凭着那颗诚挚的心，厚积的艺术理论和全国享有名气的艺术创作以及丰富的教学经验与成果，成其为首领人物，确实也不是件易事。近几年，他把广州大学美术学院的牌子越擦越亮，擦出了它在省内学术的厚度与高度，带出了一群实力雄厚、各具才气的教师精英。十多年的追求与拼搏，把学院打造得如此响亮，成就乍见，而且已具规模，院长本人的耕耘、运作与开拓，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总结的个案。今天的广州大学美术学院已是一间不可小窥的享有知名度的学府，汪晓曙是作为开荒牛，个中进程其实也不是件易事。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就注意汪晓曙这个名字了。那时的《连环画报》是全国各路国、油、版、雕的好汉们竞技的“擂台”。文革结束不久，刊物、杂志少之又少，全国几乎所有的美术精英都在这几条独木桥上横刀立马，能在《连环画报》发表作品几乎如获中国的奥斯卡提名，上得这个擂台，必是一流高手，而一流中又比拼超一流，顶级，乃至极品。《连环画报》杂志被全国所有称之为画家和美术爱好者们所注目；画报内更是风起云涌，好作品，精品，震撼叠云，喝彩之声在杂志每期都具爆炸性。这个时期的汪晓曙以大胆、新颖、充满俄罗斯欧洲情调的水彩、油画、素描和黑白形式的连环画在杂志上登坛亮相。画报的多期封面、封底皆出自此兄手笔。灰调子而无可击的造型、色彩，略带中国式写意的作品令画坛瞩目，身在广东而专注于线描、讲求新风气的我，也特别敬佩如此少见的新的艺术风格，暗暗记下和背熟了他的名字。

汪晓曙在那个年代是中国艺术上开拓新范式的先锋者，一个值得尊重和敬佩的不计功利于艺术的“傻冒”。我们那一代，完全不明白画画可以和金钱挂钩。为艺术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傻冒”们，包括被淘汰、不被淘汰、著名和不著名，都在那个年代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傻过，更不知和房子、车子、电冰箱、微波炉、山珍海味、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相联系。至今想来会掬一眶眼泪，留住一份对旧日理想主义消逝而去的深深怀恋。

真想不到，他居然会来到广州，我居然会和他有了缘分，有了切磋论道，有了共同在美协的窝里相互以羽翼取暖，也居然相互为这座二千多年的城市做点文化的份内公益。近日看到他新著的岁月如歌，那长长的自述，才知道他能有今天，完全是拜岁月和老天爷所赐。儿童时代的汪晓曙过早经历苦难，生在右倾份子的家庭而被遣送偏远山区的矿场，被打入另册，在他的身上永远有抹不去的伤痛，知青生活、招工进城与他擦肩而过……，父亲带给了他无尽的爱与困惑，生活艰难与人生低潮。今天的汪晓曙已醒悟，青少年时代的不幸，是父亲及造物主的恩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行不乱其所为，乃孟老夫子的远见，也是一条人生成长的规律，这个世界永远是那么公平，那么神秘。一个人的所谓终究有成，没有磨砺、没有雕琢，没有彻骨之寒和九灾十难，玉不琢则不成器，汪晓曙也是个典范。

他的书，无论是画册、文集和理论著作出了很多，在广州，乃至广东也十分突出；他获奖的作品、专著、教材也太多太多，我无须再当鼓吹手，锦上添花。我想说的就是希望这位新广州人的院长在繁重的教学、创作、指挥领头之余能给自己在热热闹闹、烦杂恼人的琐事中留一份恬静，在心港里能静静地泊下一弯小船，于寂静中跳出界外来看世界，留一份清醒与虚空。那么，在他现有人生所站位置上，包容，包揽万物，以天地相往还，在人生、人格上，艺术上，我想当会更生出一番境界，有助其往更高处寻觅、探索，深入堂奥。这才是值得汪晓曙注意的。

汪晓曙现在是代表岭南的一位领军人物，从岭南可以寻至他在江西抚州、南昌的学习和创作的足迹，一步步这样走过来。江西历朝都出大家，特别是陶渊明、黄庭坚、董源、欧阳修、朱熹，至今我们仰望这批人物都令人心潮澎湃；岭南于近代，文化才以其独特而繁盛，得天独厚的开风气之先，颐养着一个个新潮人物，此地是从达摩、六祖、苏东坡托起一批后发的人物，陈白沙、黄遵宪、容闳、郑观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高剑父拉开中国现代化的帷幕，引领潮头。挟江西的传统与广东的现代两地之势，汪晓曙应更能自信而行。岁月如歌，希望他的足迹随着岁月延伸，以静气来养己性，养成岭南一个艺术经典，或一大家。如是，岭南有幸，江西也有幸。我期待着。是为序。

2009年2月



目 录

岁月如歌—— 7/62

插 图—— 63/127

连 环 画——128/494

速 写——495/608

素 描——609/634



汪晓曙，1956年6月出生，现为广州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水彩画研究会会员、中国连环画研究会会员、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理事、中国美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美术教材专家评审委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美术与设计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广州市美育研究会会长，广州市美术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广州市优秀专家。作品曾入选全国第六、七、八、九届美展，入选全国第三、四、五、六届水彩画大展，入选广东省第七、八、九、十届美展。

曾获“五个一工程”奖，全国第二届连环画创作二等奖；全国水彩画大展优秀奖；全国优秀图书“金钥匙”银奖；中国连环画创作“十佳”奖；全国曾宪梓教育基金三等奖；广东省南粤优秀美术教师奖；南粤优秀教师奖；广州市优秀教师奖。

出版专著《绘画语言论》、《美术创作学》、《绘画创作论》等六部专著，总约200余万字，出版个人画册二部，编写美术教材八册，主编大学美术教材23册，在国家核心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发表水彩画作品100余件，出版连环画233套。

歲月如歌

——难以忘怀的青春记忆

不知何故，萌生要出这本画册的念头。

这其实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这本画册把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大作”剔除在外，只选用近三十年来的插图、连环画、速写和素描之类的“小品”，而且这些东西大都已在过去各种杂志和刊物中出版或发表过。惟独这篇文章还算是“新作”，原本只是想写一些文字来叙叙旧，算是为画册作序，谁知落笔后，思绪就像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序写成了回忆录，只写了从记事开始到离开江西之前的这一时期的生活经历。画册很厚，六百多页，堪称“大部头”，显得有些铺张。装帧设计倒是非常简朴，仿佛是个世纪的产品。在奢华无度的今天，在吃完就扔掉的月饼盒都要设计得豪气四射的商品社会里，出一本怎么也称得上是艺术的东西，却没有太多的华丽和靡贵，这完全符合我出这本画册的初衷并能满足我的怀旧情结，所以就这样出了。

尽管画册很厚，但仍然只能选用我近万张作品中很少的一部分，我应该算是一个勤奋的人。这些在过去岁月中留下来的作品，尽管都是些小品，但对于我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是我一生的追求和半生的心血。从这些作品中能寻找到几十年来走过的足迹，能看到一个真实的自我，能感悟到一种值得回味的人生，从而来体验当年的激情、挚爱、率真和执着。

从我六岁时在《小朋友》上发表的第一件所谓“作品”到现在，已有四十多个春秋。韶光过眼，时事匆匆，数不清的日出日落，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这些画作之上，仿佛此生只为绘画而来。回首只属于丹青的岁月，如梦、如歌，似水流年。借画册的问世，重新梳理这些作品，如重温昔日光阴，随一件件作品翻过，寻觅一段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牵肠挂肚的心迹，半生的景致尽在画里画外，这也许是一定要出这本画册的唯一理由。

有一首名为《一支难忘的歌》的歌，我一直都很喜欢，歌词是这样的：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岁月的河啊汇成歌/汇成歌/一支歌/一支深情的歌/一支拨动着人们心弦的歌/一支蹉跎岁月里追求的歌/一支永远难以忘怀的歌。这首歌，说出了我心里要说的一切——岁月如歌。

戴花要戴大红花，
骑马要骑千里马。
唱歌要唱跃进歌，
听话要听党的话。

——歌曲《戴花要戴大红花》



大学时期的父亲(1948)



中学时期的母亲(1952)



全家合影(后左为本人)

(1971)

这是50年代最流行的一首歌，那正是国家大闹钢铁的大跃进年代。任县城关镇长的父亲，不满自己所管辖的茂盛的森林被砍伐下来炼钢的做法，说了一句“木材炼不出钢”的符合科学道理的话，噩运则迎面而来，被打成了“右倾”分子，遣送到一个很偏远的山区去挖煤。

60年，我们举家搬迁到一个叫礼陂的煤矿，那是一个老虎经常出没的深山老林，老虎常常下山偷吃矿山食堂养的猪。记得有一位食堂烧火兼养猪的叔叔，姓蓝，大个儿，脸上一脸的麻子，印象中所有人都叫他“蓝麻子”，他自己也不忌讳，乐意应答。那一年他只身用烧火用的铁叉打死了一只来偷猪的老虎，据说那只老虎的天灵盖都给砸碎了。蓝麻子披红挂彩的站在临时扎好的高台上领奖，还得到20元钱的奖金。在我们孩子眼里，蓝是一位打虎的英雄。看完蓝授奖后，回到家里我即兴画了一张《蓝叔叔打虎》的画，还用彩色蜡笔着了色，算是图画课的作业。老师看了以后很是高兴，便把我的第一幅“作品”寄到《小朋友》杂志社。半年后，居然发表了。还寄了一本《小朋友》通过老师转给了我。县文教局也十分高兴，奖了一枝铅笔、一盒蜡笔和一本图画本。图画本的封皮上用毛笔写上“奖给汪晓曙小朋友”，还盖上了县文教局的公章。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成功，也是记忆最深的一件事。

帮我寄画到《小朋友》编辑部的老师姓陈，是一位长得十分标致的年轻姑娘，儿时的偶像。听母亲说她是一个资本家小姨太的女儿，师范学校毕业后，因为成份不好，来到矿山教书。所谓的矿山子弟学校，只有她一个老师，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语文、算术、音乐、图画、体育全由她一个人来上，全“校”的学生不到三十人，都在同一间教室上课。课桌分成四列，一列一个年级，老师先上一个年级的课，另外的年级做作业，然后逐个年级上下去。课堂上所犯的最大错误是高年级的学生抢着回答低年级的提问，惩罚是站一节课。尽管处理严格，几乎每天都还有罚站的“勇士”，想来也正常，逞能是儿童的天性。上课最怕下雨，教室是茅草盖

的，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要带斗笠上课。学生的年纪相差很大，因为没有幼儿园，我五岁就上了一年级。班上有一个留级三年的学生，比我大五岁，我们都很怕他，只要他看谁不顺眼，就把鼻涕涂在谁的身上，而且他的鼻涕取之不尽，但大家又很服他，因为他居然敢和四年级的哥们打架，而且能打赢，为我们一年级的学生扬威。我和他倒也能玩得来，他最害怕的图画作业大都是我帮他修改或完成的。

创作《蓝叔叔打虎》的初衷，还不完全是因为蓝麻子，而是为了一个小伙伴。刚到矿山时，隔壁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小女孩，那天下课后便带我一道出去玩。山脚下，长了一大片芦苇和杂草，与我的肩头一般高。仲秋时节，芦花开了，一片白茫茫，风吹过来，发出嚓嚓的响声，我采芦苇，女孩摘野雏菊。那已是黄昏时分，满天飞舞着蜻蜓，密密麻麻，太阳已落到山的后边，把云烧得通红。

突然间，我好像听见前面的草丛中有沙沙的响声，于是喊了一声小女孩的小名，听到喊声，她举起采好的一束黄色的小山花向我摆了摆，不知说了句什么，又弯下腰去采摘着她喜欢的小雏菊。一阵轻风过后，一切都静了，静得能听到我抽出芦花的清脆响声和自己的呼吸。突然，又一阵沙沙的响声过后，只见一团黄灿灿的东西一跃而起，扑向女孩……我知道那一定是老虎，霎时我吓得失魂落魄，之后再也没见到那个女孩。

我画蓝麻子打虎那张画的时候，把他的拳头画得特别大，很有力。老虎的头上，用红蜡笔使劲地涂，心里想，老虎的血流的越多，它一定死得越快。我一直都坚信，被打死的老虎一定是扑向女孩的那一只。

从那以后，那一团跃起的黄色仍然常常在我梦中反复的出现，向我扑来。

矿山最为恐怖的是汽笛声。笛声长鸣，井下一定出了事，妇女和老人们便呼号着狂奔到井口，盼望着井下的亲人出来。每一次笛声响过，礼堂就要开一次追悼会，就会唱《国际歌》，在我的印象中，《国际歌》是专为矿难的矿工们唱的。七岁时，我为那位留了三年级的“鼻涕王”画了一张肖像，因为他的父亲就在一次笛声响后再也没有回来，取名为《唱〈国际歌〉的强强》。向母亲要了八分钱，悄悄到礼陂的镇上把这幅画寄到《小朋友》编辑部去，但泥牛入海，没有回音。有一段时间，只要看见邮递员，就会去问有没有我的信，时间长了，也就把这事给忘了。

四岁以前的事，我几乎没有任何印象，但可以肯定是很幸福的，当时父亲在南城城关镇当镇长。有一张照片：我穿着大红条纹衬衫、吊带工装裤，还穿着一双皮鞋，和穿着花裙的姐姐合影。在五十年代，这已够时髦了，现在来看也不土气。那时候，父母都在工作，生活都由祖母来安排，



父亲(中右)参加县水利工程通水典礼剪彩时留影 (1958)



父亲(前中)与战友临别留影 (1959)



与姐姐的合影

(1960)



外婆与母亲

(1974)



父亲（右2）与同事合影

(1962)



父亲在北京参加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时在颐和园的留影

(1966)

祖母在旧社会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解放后，那种生活习惯也没改，对孙子孙女的打扮，她是费尽心机的。她时不时可以拿出一块银白色的有一个光头人像的东西换一些布料和零食回来，当然这些都要瞒着父亲。祖母算得上是一位做女红的高手，能自己缝衣服做鞋。她给我唯一的印象是用铜壶抽烟，烟筒很长，左手托着，用右手把烟叶装进黑黑的铜嘴，然后拿着冒烟的纸引子，一吹便着了，吸烟时发出汩汩的声音。看着她老人家抽得如此有滋有味，我想那一定是好东西。一次趁祖母不知道，抱着铜烟壶偷偷地吸了一口，满嘴的黄水，苦得叫天。从此便开始同情祖母了，如此的苦味，她老人家居然不怕。

祖母的穿着很是讲究，夏天穿深棕色的香云纱，冬天披一块有花的头巾。祖母是小脚，很尖，鞋子上的花是祖母自己绣的。她的抽屉里有一本绣花用的花模样本，好看极了，这是我最早学画画的蒙本。祖母识字，她每翻开一页，就会告诉我这是什么花，这种花的色彩和开花的季节。我记忆中那时的房子四周都开着各种花，祖母常常带我一道去赏花，我也会去照着花作画，这也许是我最早的“写生”。

父亲也许过于自负，也许不太识时务，而且听母亲说他常常仗着自己读过书有文化而瞧不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同僚和上级，包括祖母的做派他也看不惯，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一方面，父亲出身在一个可以说是富足的家庭，书香门第。爷爷倒是一个纨绔子弟，解放前败了家，成份划成贫民，也许在当时倒是一件好事。父亲曾在省城国立大学念书，加入了共产党，由于闹学潮，没有念完书就被开除送回到老家，但仍然做在学校做的那些事。解放后在县公安局当局长，但又同情地主，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放走了一个将要被镇压的地主而犯下大错，降了职。后又凭着自己的能力当了县城关镇的镇长，他继续“犯错”，反对砍柴炼钢，发配到了煤矿挖煤。尽管如此，他仍然坚信他自己的信念，热爱共产党。犯错了，怎么降职都行，只要不开除党籍。另一方面，传统思想、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常常交织在一起，家中的书比任何东西都多，有西方的哲学著作、文学著作，如《红与黑》、《茶花女》、《三个火枪手》……喜欢黑格尔和叔本华。还有中国的传统书籍，如：《道德经》、《论语》、《诗经》、《易经》、《红楼梦》、《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等，喜欢郭沫若也喜欢鲁迅的东西。还有很多当时十分时髦的书，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希金诗集》、《莱蒙托夫诗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等。他特别喜欢毛泽东诗词，常常是找到一首抄一首，还能背下来。父亲写得一手好书法，文革前还入了省书协。我印象中，他同情农民，但又轻视农民，到矿山时他交了很多的工人朋友，但又从心底瞧不起工人，他热爱劳动，但又

常常暗示我们切不可体力劳动来谋生。我自小想当一名画家的志向，除了自己的爱好外，完全是父亲的引导。父亲常常和我一起“合作”，他写书法，我画画。记得我画了一枝梅花，他便在上面写了一首毛主席的《咏梅》诗，在家里的墙上还挂了好多年。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
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

——歌曲《北京的金山上》

2

父亲在矿山“改造”了四年后，调到地区工作，不久，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父亲从政一生，应该算是一个好干部，一个有良心的官。事实上，他的职位是越来越低，官越做越小。但他坚守自己的信念，也坦然显示他自己的赤子情怀。他所处的时代，从土改、肃反到大跃进，从反右、社教到文革，无论在哪个阶段，都无法让他一个正常人的良心得到庇护。所有这些运动，除土改外，他都是被冲击的对象，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做一个正直的人，是父亲留给我唯一的精神信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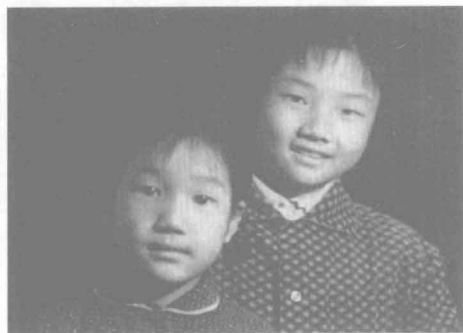
文革开始后不久，我们全家被赶出了专署大院，住进了“老地委”宿舍。老地委宿舍在解放前是国民党的党部和官邸，解放初期，地委也设在这里，干部们都住在这里。后来地委、专署搬迁，这里的大干部都搬到新地委、专署大院去住。剩下一些普通干部和职工住在这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一大批所谓的“走资派”，还有一批“靠边站”的干部，原来住在“老地委”的革命群众搬进了地委、专署大院。而这一批“走资派”和“靠边站”的人又搬回到“老地委”宿舍，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老地委”宿舍包括两个大院。解放前这条路叫“官府路”，解放后改成“阳光巷”，两个大院分别为15号和16号，我家就住在15号大院内。

这两个大院解放前应该是非常豪华的地方。一幢幢建筑是清一色的青砖黑瓦，木梯石柱，楼上楼下，只是多年失修，特别是地委搬走后，更显得有些破败不堪。院子很大，十几幢楼房之间用青石板相连。我们家住在大院的最靠大门的边上，中间有一个很大、很空旷的禾场，据说原来养了



外公、我（右）与弟弟（左） (1974)



两个妹妹的合影 (1972)



父亲去世后全家合影 (1974)



高中毕业留影 (1973)



在“老地委”阳光巷15号的住所前我（左）与何祥孚老师（右）、李抚生（中）画友留影 (1972)



初中毕业时我（后左）与同学的合影，后右为唐高潮、前左为姚小林、前右为吴翹璇，四人均为学校宣传组成员 (1971)

很多的花草，还栽了很多的树，我们搬进去时，只剩两株很高的白玉兰树，十几米高。一到春天，玉兰开花了，雪白硕大的花瓣，橙黄橙黄的花蕊，香气扑鼻。到了夏天，叶子遮天蔽日，是整个大院唯一有生机、有生命感的植物。

阳光巷15号搬进了一大批原来都是坐“伏尔加”和“北京”吉普的大官：地委书记、专员，还有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国防工办主任等等。被打倒的只见家属和子女，“当权派”到农场或劳改所劳动去了，有些被“管制”了起来。倒是“靠边站”的领导住在院子里，无所事事，常常帮保姆做些家务。院子里有一位地委副书记，长征干部，出身也好，但没有什么文化，也许没有犯什么大“错误”，属于“靠边站”的人物。他每天一大早站在大院门口，叫来“换尿”的菜农，把一天全家人拉在尿桶里的尿，换几分钱，并经常和换尿的菜农面红耳赤的讨价还价，和平民百姓没有什么两样。院子里有一位长年戴着很深眼镜的“特务嫌疑人”，姓奚，据说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学潮时的领袖人物，解放后在苏联大使馆工作，和苏联断绝关系后到地区当了地委宣传部长。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能看英文报纸和俄文杂志。还听说他和被打倒的北京的大官邓拓有书信来往，但又听说周总理在苏联还表扬过他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所以他只是没了职务，并未受到太多的冲击，他还能看英文版的《参考消息》。

那天，我坐在大院大门的石阶上画速写，部长正好路过，也坐在我旁边看我画画，还挺有兴致。等我画完那张速写后，他拿着我的速写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每看一张都要问我一些问题，我都一一回答。之后，他表扬起我来：“画的不错，要坚持画下去，不能间断，速写是学习绘画最重要的基本功。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这些油画家，速写都画得非常好！”

我一时不知他说的这一串外国名字都是些什么样的画家。他见我一脸的迷惘，也猜到了一二。他轻轻的在我耳边问我是否见过这些画家的作品？我摇摇头，他要我吃了晚饭后到他家去一趟。

部长开开一只樟木箱子的锁，打开箱盖，里面全是《毛主席著作》、《列宁文集》、《马克思全集》等等。还有一些俄文版的书，上面都印有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头像，也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大学》等一大批当时可以看的著名文学书籍。他从箱里的最底层抽出四本八开大小的大画册，全是俄文版的俄罗斯美术作品。

我当时一阵激动，我从来没有看过印刷的如此精美的画册和画得这么

好的外国油画作品，我忘记了一切，坐在地板上仔细认真地翻看起来。

我第一次看到了如此美轮美奂的作品，心中顿生希望能临摹这些作品的欲望。部长也许看出了我的心思，主动提出让我借一本画册到家里去看。他拿了一张《人民日报》，把画册包了起来，还用一根绳子绑成“十”字，打了个活结，放到我的手上。再三叮嘱说：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不然事儿就大了。后来我才知道，把这些画册和书留下来，连他夫人都不知道。

这是一本列宾的画册，里面有很多列宾的素描、速写和油画作品，还有文字介绍，可惜看不懂。

我能在刚刚学习绘画的早期就能看到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品，对我而言是一种幸运，噢噢之中，仿佛有人在相助于我。我把画册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也很是感动和兴奋，把他自己的书桌空了出来让我在他的书房里临摹，而且交待外婆不要让外人进来。那一段时间，我几乎不去学校了，躲在家里，把一本画册从头到尾临摹了一遍。父亲还借了一架照像机，把一些好的作品翻拍了下来，在自己做的暗室里冲洗出来，父亲为了我是费尽心机的。

父亲是在我下放农村的第二年去世的。长期的压抑和起起落落，使他在永远的无望中顽强的生存下来，直到无法坚持之后仍在执着地去苦苦追求自己的信念，其代价，便是疾病结束了他49岁的一生。临终前，父亲单位的领导主动提出将我调回城里安排工作，这在当时是天大的好事，父亲居然谢绝了。他把我叫到身边告诉我：一切要靠自己，在农村更能激发人的上进心，若回城做了工人，也许不会再去努力了，永远是一个工人，在农村上大学的机会会更多一些。他一辈子的心愿便是希望我上大学，而且从来没有改变过。记得我小学毕业时，被省体工队看中学体操，他不同意。初中毕业时，四个面向，市文工团看中了我绘画的才能，决定招我到团里做美工师画布景，这本来也是天大的好事，父亲居然坚决反对，非让我继续上高中。高中毕业本可以去当兵，也是父亲连体检都不让我去。他从心底崇尚知识，崇尚文化，希望我能上大学。他深植赣东文化源远流长的土壤之中，一直都有一种尚文情结，这情结，是他一生的追求和向往，而且希望延续到我们这一代。父亲临终前所做出的决定，给我断了回城的梦，现在看来，他的决定是正确的，激发了我积极向上、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信心。他最后对我的嘱咐是：学好一门手艺，学好文化，千万不要像他那样从政做官，要做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正直的人。



临摹过的列宾素描



临摹过的列宾素描



临摹过的列宾油画《意外归来》



临摹过的列宾油画《伏尔加纤夫》



临摹过的基达也夫油画《走向生活》



临摹过的沃诺戈夫油画《要塞保卫者》



临摹过的赛罗夫油画《起义前夜》



我（前中）高中时与美术老师袁宗润（后右）、张叔生（后左）和学校宣传组同学李抚生（前左）、杨建林（前右）的合影（1971）

3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绘画是我一生的追求，而文革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机会。小学毕业后，升入中学，那正是文革的初期。学校不上课，开批斗会，上街游行，出宣传栏成为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能画画写字，在学校里是最受重视的。中学时期，每一个班每星期出一期宣传栏，给了我学习画画的极好机会，班与班的竞争又成为提高绘画水平的动力，后来我成为整个学校出宣传栏的中坚力量。

我们中学有一位叫袁宗润的老师，早年毕业于杭州艺专，不只是画画得好，书法也好，还拉得一手好胡琴。进入校宣传组要由他来进行考核，考核的内容就是画一张宣传画。袁看见我不到一上午就画完的两张全开纸大小的大幅水粉画后，拍着我的头说：就你了。先生是一个极有才情又有修养的人，常常是自己拉着二胡，一个人变着声音把《沙家浜》中“智斗”一段的三个角色唱完。画画只会画中国画，而且只画花鸟、山水，从不画人物。他的美术字写的烂熟，从不打稿，大排刷直接上，如印刷一般，但大幅宣传画只有我来完成。当他看见我把四张大纸贴到墙上，用大排刷画画时，老师的架子便没有了，倒像一个学生，站在我背后叫好。他当年在杭州艺专读书时，潘天寿先生是他的老师，学的是山水。当只有我们二人在一起时，他不再唱《沙家浜》，而是唱《将相和》；不再写美术字，而是写书法，听他讲杭州艺专，讲潘天寿、傅抱石、赵无极、徐悲鸿、齐白石……

袁有一件他最值得炫耀但又不敢讲出去的经历：他给蒋介石画过像，这是他喝了小女儿结婚的喜酒后才告诉我的。

那是1948年的事，国民党兵败之时，蒋介石到赣州与蒋经国见面，路过抚州并住了下来。抚州一中从前是百年书院，大树参天，湖水碧绿，小径通幽，树林深处有一些小别墅，蒋当时就住在那里。袁先生在画风景写生时，正巧蒋从树林的小路出来，看了袁的作品后，顿生兴致，要袁给他画一张人像速写。袁先生是在有六个警卫员的“保护”下，战战兢兢完成了那件特殊的作品，画完后，蒋还在画上签了名，留给了袁先生。袁对蒋

介石的评价是：太平易近人了！

裘先生后来出了一件大事。那是“九大”召开的当天晚上，校宣传组的人都在为庆祝“九大”召开赶制一幅大型宣传画，由我主笔，画面的中间是一幅毛主席像，下面是全国各族人民欢呼的场面，宣传画的上面是裘写的“庆祝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的标语，画的下方本来也是由裘写“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对所有伟人都是特别敬仰的，主动提出这排字用金纸剪出来再贴上去更醒目，我们自然也是同意。凌晨我们几个人把宣传画贴完后，便回到宣传组的办公室睡去了，裘一个人去贴用金纸剪出来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字。也许是一夜没睡，过于疲劳，他老人家把“万”字和“无”字调过来贴上去，变成了反动标语。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入狱，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才放了出来。

裘先生是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且十分典型。批斗他时，有一个学校的工宣队队长最积极，当裘怎么也不承认他把两个字贴反了是故意的时，则被那位工宣队员狠狠地刮了两记耳光。我站在会场的最后面，也能听到那击打在皮肉上的声音和看见裘的嘴角流出的黑红黑红的血。

其实我们也未必真正了解文革中发生这一切的真正原因。隐约之中，文革开始时，周围的人都是那样的拥护，仿佛是盼望已久。记得父亲从矿山调到抚州地区专员公署工作之后，才知道专署、地委大院的孩子们是从父母乘坐的轿车来确定同伴的地位和身份的，就已经知道坐“伏尔加”一定比坐“北京”吉普的官要大。我们这些大院的孩子，几乎不和住在小胡同和“城外”的孩子交往。专署、地委和军分区的孩子还常常联合起来与居民的孩子打群架，同是一个院的孩子也因父辈官的大小排出座次。包括进学校：三个大院的孩子在实验小学和一中上学，工厂的孩子比较多的在二小、六小和三中，居民和城外的孩子只能在三小、四小和二中了。刚搬进专署大院时，一位邻居的孩子来找我玩，他很认真地告诉我，谁谁的父亲是“长征”干部，谁谁的父亲又是“三八”干部，谁谁的父亲是“南下”干部，谁谁的父亲是“土改”干部，这肯定都是他父母的私房话被他听见了。我当时还为自己被划到南下干部子女之列而不快，心里老在想父亲干啥不去长征、不去打日本呢？细细想来，如果一个社会硬把人分成三五九等，干部都凌驾在百姓之上，甚至欺压百姓，一有运动，老百姓能不给你戴高帽子游街吗？

记得在地委的一条很长的围墙上，所有的单位都分配了一块大约长十米的墙面来出宣传专刊，从某种意义而言，成为当时抚州市的美术界打擂



高中毕业时本人创作（合作）并出版的年画《做红色接班人》（1973）

台的地方，所有单位都推出最强的绘画人才来进行专栏的制作。几乎在每一个月都要出一期宣传专刊。在这种竞争之中，我自然代表学校的宣传主力而成为市里美术界关注的人物之一，并经常参加市里和地区举办的各种美术创作学习班。在那里，结识了地区几乎所有的美术“名人”而且也被列入其中。

在这批“名人”之中，我的年纪最小。作为一个中学生，自然要很虚心的向所有的人学习，而且身份又是平等的。这种特殊的状态对我而言更是如鱼得水，不经意悄然打入当时市一级的美术圈子，又由于这种状态的不断发展，还参加了省里举办的各类美术学习班和美术创作组，以最年轻的美术工作者的身份与省、市的美术权威人士接触、交流、学习和比拼。

初入画坛，那是一个令人胆怯而又向往的地方，从中学生到知识青年的十年，正值是“文革”的十年，也正好是我拼搏角逐的十年。这十年是漫长的，漫长得使我的记忆目不暇接，有永远也回忆不完的故事。但这种回忆又十分单调，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记忆，美术成为那十年中唯一的生活经历。由于当时的无知产生了错觉，仿佛一个偌大的世界，只有美术。尚不知道这个领域是如此的狭小，对一个专业的过于执着，往往会产生极强的排异性和偏执性。中学期间，除文革的因素不能正常学习外，自己对其他学科的偏废也是重要的原因。对于一个画家而言，过于单纯的知识结构实质上是艺术生命走向殇性的根源，当我在很多年以后才认识到了这一点时，再去弥补则花去了双倍的精力。人类知识浩如烟海，绘画，甚至整个艺术都只是沧海一粟。



知青们和大队书记在一起 (1973)



知青队“双抢”劳动的场面 (1974)

4

我们的田野，
美丽的田野。
碧绿的河水，
流过无边的稻田，
无边的稻田，
好象起伏的海面。

——歌曲《我们的田野》

73年12月，我结束了中学的生活下放农村，以知青队的组织方式在一个偏僻的山村落了户。知青在当时是一个不确定而且多变的群体，“上山下乡”运动实质上是通过一个亚文化群体对贫文化群体的相互渗透和相互改变的手段。另一方面，这一群在城市已被惯坏和荒废了的孩子，仿佛已变成了社会的负担，只有分散到广大的农村去才能销声匿迹，并得到